

# 没有财产权的权力

[美] 阿道夫·贝利著

江 清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2 019 0236 1

# 沒有財產的權力

美国政治經濟学的新发展

[美] 阿道夫·貝利著

江清 譯



內部讀物

商 務 印 書 館

1962年·北京

*Adolf A. Berle, Jr.*  
**POWER WITHOUT PROPERTY**  
**A New Development 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New York 1959

內部讀物

**沒有財產的權力**

美國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美]阿道夫·貝利著 江清譯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7 號)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裝

統一書號：4017·38

---

1962 年 9 月初版

開本 850×1168  $1/32$

196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數 118 千字

印張 5  $8/16$

印數 1—2,500 冊

定價 (10) 0.85 元

## 譯 者 前 言

本书作者阿道夫·貝利是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辯護士，是“人民資本主义”神話的主要宣傳者之一。他于 1895 年生于波士頓，1916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作过律師，作过教授；1932 年成为罗斯福總統智囊团的一个成員；还作过国务卿助理（1938—1944）和駐巴西大使（1945—1946）。同时他也是大公司的法律顧問兼美国糖蜜公司的董事長。

他的主要著作有《現代公司和私有財產》、《政治力量的自然選擇》、《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1961 年商务印書館有譯本出版）等书。美国进步作家維克多·佩洛說：“他以前的著作大多是具体研究和荒謬理論的混合物，但是他最近出版的几本书却是毫无認真研究迹象的赤裸裸的宣傳品”。《沒有財產的权力》这本书就是他继《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之后所写的这样一部宣傳品。

在本书中并没有什么新鮮的东西，仍然不过是“人民資本主义”神話里面的那一套陈詞濫調。他力图用一些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来証明財產和管理权已經分离，胡說什么現在領導美国大公司的并不是金融寡头，而是一些拥有权力但沒有財產的专业經理；胡說什么美国政府时时刻刻在干預股票經紀人的活动，以便指導經濟活动为社会造福；胡說什么現在美国工人階級过着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生活。书中还专用一章来对比美国的資本主义制度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力为壟断資本主义塗脂抹粉，并誣蔑社会

主义，认为这二者会越来越相象。事实胜于雄辯，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值一駁的。不过由于它是一部为壟断資本主义大吹大擂的宣傳品，得到壟断資本家們的賞識，在資本主义国家中頗有一些市場。我們譯出这本书，完全是为了把它作为反面教材供学术界批判之用的。

# 目 录

|                                                |    |
|------------------------------------------------|----|
| 前言 .....                                       | 3  |
| 导論: 分別为企业家、美国自由主义者、学者和不承担<br>义务的公众写的四篇前言 ..... | 5  |
| 为企业家写的前言 .....                                 | 7  |
| 为美国自由主义者写的前言 .....                             | 14 |
| 为学者写的前言 .....                                  | 20 |
| 为不承担义务的公众写的前言 .....                            | 27 |
| 第一章 資本的各种习性及其影响 .....                          | 31 |
| 資本的变化情况 .....                                  | 31 |
| 資本: 1919—1947 年 .....                          | 34 |
| 1947—1957 年的十年 .....                           | 42 |
| 由个人供应的資本 .....                                 | 46 |
| 資本的运用: 資本的形成和冒險 .....                          | 50 |
| 法团权力和公司控制权的連鎖反应 .....                          | 55 |
| 經濟权力和将来的发展 .....                               | 60 |
| 第二章 財產权的分裂 .....                               | 62 |
| 法律上的发展 .....                                   | 62 |
| 个人与經濟創制权的分离 .....                              | 63 |
| 分配图表 .....                                     | 67 |
| 不断变动的权力所在地 .....                               | 71 |
| 第三章 經濟权力的哲学 .....                              | 79 |
| 权力的社会現象 .....                                  | 80 |
| 行使中的权力——直接和間接的效果 .....                         | 83 |

|                            |     |
|----------------------------|-----|
| 經濟权力的限制和控制 .....           | 89  |
| 政府控制的和非政府控制的經濟权力 .....     | 94  |
| “合法性” .....                | 99  |
| “一致的公論”：經濟民主主义的现实問題 .....  | 110 |
| 第四章 經濟共和国 .....            | 117 |
| 生产 .....                   | 119 |
| 持續性 .....                  | 121 |
| 个人参加經濟生活的机会 .....          | 122 |
| 經濟計劃 .....                 | 124 |
| 政府計劃的工具 .....              | 127 |
| 私人計劃的工具 .....              | 130 |
| 工作的权利 .....                | 132 |
| 最后的权威 .....                | 133 |
| 第五章 人民資本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展望 ..... | 139 |
| 財產权力范围大小的相似性 .....         | 139 |
| 資本的形成：同和异 .....            | 145 |
| 国际經濟：合作呢还是互相冲突呢？ .....     | 149 |
| 权力的控制 .....                | 150 |
| 各章的注釋 .....                | 156 |

## 前 言

1958年春承普林斯頓大學邀我在那里發表斯丹福·李特爾講演，這使我有機會把我花了一點時間作出的某些研究成果編輯在一起。那幾次講演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至少在工業發展方面，美國的制度現在是否不僅要從經濟學的观点來考察，而且必須從政治學的观点來考察。

當我從事於這個問題的研討時，出現了几本頗有意思的書。其中一本是約瑟夫·李文斯頓的《美國的股票持有人》，下文將予以論列。另一本是保爾·哈布萊克特博士的關於年金基金會的研究，不久將由二十世紀基金會出版。這部著作我已看到了原稿，並得哈布萊克特博士的允許，利用了其中的某些數字。第三本是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教授的文筆犀利的著作《豐裕社會》，它在我修改本書時提醒我注意從經濟方面考慮問題的新的境界。此外還必須提到愛德華·梅遜院長的《經濟集中和壟斷問題》。他的意見並不是說權力集中的論據必然是錯誤的，而是說：

目前人們之所以紛紛談論集中，一部分的原因很可能是在於他們抱有這樣的錯覺，認為在過去不太遠的時期經濟是競爭性的。

顯然，光說某一件事過去一向存在，只是不為人所認識，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無論如何，隨著受“一致公論”的抑制並向其負責的集中了的經濟權力的出現，也確實顯現出了一個民主經濟的輪廓。這就在下列兩種勢力之間確立起一股很好的緩衝力量：可以稱為“民主

的”势力,以及其权柄不是得自公众的委托而是得自有历史背景的产权的势力。

我应当感謝哥倫比亞大學的高等法人組織問題研究班,因為有三、四屆的學生曾經同我辯論過這些問題;也要感謝保爾·哈布萊克特博士,因為他允許我利用他所搜集的資料;同時也要感謝馬克斯·阿斯科利博士,因為他審定了我的某些有關政治學的理論。

我還應當感謝馬加萊特·普爾小姐,因為她曾盡力使原稿具有可以排印的形式。

阿道夫·貝利

1959年1月于哥倫比亞大學

## 導論：分別為企業家、美國自由 主義者、學者和不承擔義務 的公眾寫的四篇前言

我並不認為本書所得出的結論都是確定不移的。進一步的研究和評論可以修正這些結論，或許把它們完全推翻。可是我確信，無論是誰，只要認真面對這裡所提出和闡釋的作為論據的事實，就會覺得他對於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過程和制度的看法，將不斷地加以改變。本書所研究的，是成為不斷進行的美國社會革命組成部分的一系列互相關聯的經濟連鎖反應。這一革命受着使它活動的推動力的鼓舞，有力地影響着我們全體的生活。在將來的歲月里，這種影響可能更為顯著、更為深遠。革命的過程對於若干立刻就牽涉的集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是其他每一個人也應該對它有所了解。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對一些已經發生興趣和在某些情況下表示過反對意見的集團，撰寫一篇直率的評論文章。

近幾十年來，企業和企業家一直是這一革命的主要的、雖然是缺乏理解力的工具。自由主義者向來是使國家一再參與這一革命的主要動員者。學者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事實，並且同樣重要地，也提供了關於這些事實的重要意義的見解，通過這些事實和見解，我們才開始懂得這一美國運動的原動力。很明顯，不論自覺或不自覺，我們大家都是這一運動的參加者。

一生中間，某個時期從事法律和經濟學的學術研究工作，另一

时期又在律师界、实业界、外交界和政界经历相当嘈杂的实际生活，这种生活上的波动使我很自然地——几乎是本能地——感到政治学的学究气的抽象理论和人类的社会政治成果有着直接关系。我想到大企业时就不能不想到政府机关和在其中工作的人们，想到经济政策时就不能不揣想那些对调查委员会作证的人们，或是执行一套一套规章条例的官吏。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中一种有力的、恒久的影响力量；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我所熟悉的人们：我的父亲、路易斯·布兰德斯、罗伯特·拉弗勒特、乔治·诺里斯<sup>①</sup>、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政界和文化界中我的朋友，他们作了调查研究工作，草拟了大纲，制订了法律，并为这种运动而斗争。最后，无论对于我或是任何别人来说，要离开关于男男女女特别是孩子们的遭遇的活生生的电影镜头来考察一种经济制度，那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不可能的。

然而，最为有关的各集团却简直没有露出任何迹象，说明他们了解自己在这一场面伟大的戏剧中所担任的真正角色。这或许是由于他们也象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大多数参加者一样，一般都用过去的说法来考察将来的事物。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向后看的。而是因为所有的说法都反映过去的经验。而将来和将来的惯用语都在前面。只有在以后，新的事实和新的分析才能得到新的说明。

在这四篇前言里，人们被说成我所认为的样子，而不是被说成

---

<sup>①</sup> 路易斯·布兰德斯(1856—1941)，美国法律学家，于1907年至1913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著有《别人的钱》、《规模庞大所造成的灾难》等书。罗伯特·拉弗勒特(1855—1925)，美国的政治领袖，于1885年至1891年任众议院议员，后为参议员；乔治·诺里斯(1861—1944)，美国政治家，于1903年至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后为参议员，均曾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

他們自己所认为的样子。有些人会感到吃惊。企业家将发现他是一个政治家和政治委員——或許甚至是一个革命的政治委員。自由主义者将发现他是一个傳統主义者。两者都被鑲嵌在固定的框子以內，这种框子是許多人会憤慨地加以否認的。学者将发现他既是一个圣职上院議員，又是一个立法者。

我們其余的人将发现自己是一个經久不断的选举的不自覺的投票人，这一选举不断地使一种分裂而互相竞争的財產权的制度，朝着一种或多或少被控制的权力的制度轉变。我們也許喜欢它，也許不喜欢它，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它。

### 为企业家写的前言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1959年)，美国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的總經理，正处于非常尷尬的境地。有些人了解这点；有些人則不了解。他所得到的东西大大少于他所应得的一份，同时又大大多于他所应得的一份。从純产量上看，現在为大企业所統治的美国經濟已証明比世界上任何經濟都有更大的生产力。在社会立法和工会力量的共同刺激之下，它已使生活水平有了或多或少連續不断的提高(所謂生活水平，我指的是工业体系中差不多所有的人的实际工資和购买力)。在消除一陣一陣发生的不誠实行为或类似不誠实行为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展，在过去几十年間，这种陣发的不誠实行为十分頻繁，使我們这一制度的名誉受到了損失。实际上全世界——共产主义世界以及非共产主义世界——都需要重复这种成就。

的确，企业家在作出这种成就时，获得很多助力。無論在企业

界或政府中，誰要是說“他”作出了某種成就，一般說來都確實是在撒謊。是他和許多別人共同作出這種成就的。然而，一種制度的負責領袖們有權利享受成功的榮譽，正象他們必然要對失敗負責而承擔污名一樣。在其他歷史時期里，這類人都會得到某種現代極少數（如果有的話）美國企業家所能得到的名望和褒獎。在十七世紀，他們會被封為公爵。即使在現今半社會主義的英國，很多人都成了世襲貴族，而且那些真正希望得到它的人結果都進上了議院。由於世襲的貴族爵位意味着被剝奪了獲得英國政治生活中最高獎賞的權利，因此一種新的辦法是獎給終身為止的貴族爵位，以便偶然的繼承不致於使企業家的兒子不能進入下議院和獵取內閣職位。

在美國就不是這樣。很少有人知道，而且大多數人也不去注意，誰是通用電氣公司或美國鋁業公司、美國鋼鐵公司或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聯合化學公司或大西洋和太平洋茶葉公司的現任經理。在公眾保有的公司里，一個美國企業家通常不能象三十年以前摩根、范德比爾特、貝爾芒特、洛克菲勒、梅倫和戴維斯發財致富那樣，確實發一筆大財。他只能好好地工作，掙一筆稱心的獎金，拿一筆優厚的津貼，或許附帶弄一點錢。如果有相當的好運氣，他也確能變成“小康”，並且使他的家庭過舒適的生活。可是他的兒子就必須和別人一樣出去尋找工作，當然，要是他甘心於過那小康的無業游民的日子，那是另一回事。

企業家也能參加政治活動，一般都是通過委任途徑。最近很多企業家都在華盛頓擔任內閣職務。他們很快就發現這種職業簡直没有什么好處。歷任各種職務以後（在這些職務上，他們大多數都曾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們都願意回去在老人牌燕麥公司或通用

汽車公司中、在傳統的大市銀行或商業法律事務所中，過（比較）有保障的生活。當他們回去的時候，人們一般都用“這些時候你在什麼地方？”這類問話來歡迎他們。只有當他們搞起販賣他們可能有的政治影響和友誼關係的生意的時候，他們才能把自己的經驗變成真正的、雖然是有些靠不住的金融資產。更經常的是，這些人在躲開政治職務以後，都要搞搞公益的工作。這可能意味著從為母校籌募捐款起到建立一筆基金為止的一些事情。但這時他們所得到的褒獎和聲望，不是為了他們持久的經濟和實業的成就而給予他們的，而是為了他們的業外活動而給予他們的。

我認為這是由於三種原因。

第一個原因（關於這點，人們毫無辦法）是，美國嚴謹地用不給與它的一切掌權者以永久性聲望的辦法來整飭他們——例外的只是對於少數象華盛頓、傑克遜、林肯、威爾遜和兩個羅斯福那樣的特出人物。（他們都不是企業家。）認為美國是“唯物主義者”的歐洲人不妨想想這樣一個事實。任何美國人都能告訴他馬克·吐溫是什麼人；可是很少人，如果有的話，能夠記得任何歷史時期的國務卿是誰（當然除去現在的一些人以外）。我們曾經有過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約翰·海之所以為人所熟知，是因為他寫了一部林肯傳和一首叫做《小短褲》的詩，而不是因為他通過海—龐斯佛爾特條約建立了西半球的和平。如果政界中人這樣倒楣，我們怎能希望現在的企业家將過得更好呢？

第二個原因更深刻些。企業家簡直不承認讓他們以外的某一集團或某些集團評價他們的工作並作出判斷是必要的。這我並不是說他們應該不斷地受到批評；我是說只有有了很多完全獨立的意見，才能有實效地贊揚他們的成功和譴責他們的失敗。企業家

往往抱有違警罪法庭被告人的看法，人們對他說他會得到公正的處理，他回答說這正是他所害怕的事情。然而，很明显，只有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褒獎才是值得享有的。如果你在適當的地方登了足夠的廣告，而且你的通聯工作人員又干得相當出色，那麼，你就能從各種組織——從印第安納州洛塔斯港的初級商會起到全國制箱工人協會或实况錄音廣播站聯盟的“本年名人”提名錄為止——那里獲得一種“獎賞”。願上帝恕我們無罪，你甚至還能從某些大學得到名譽學位；然而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要誹謗一所高貴的學校對於一個高貴的企業家所給的獎勵，這個企業家對它有所貢獻，應該光榮地得到學校所僅僅能夠給予的一種“謝禮”。但是，這種東西既沒有魅力，也不能令人感服。更經常的是，你的受獎的企業家將最珍惜一小群不著名的獨立的朋友們給他的某種小紀念品，這些人真正懂得好壞，他們所處的環境使他們不該說什麼話，可是他們覺得不得不私下里誠懇而沉着地說，某某人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但是這不是社會的褒獎，也不能代替社會的褒獎。

因此，我曾竭力主張需要有一些“聖職上院議員”來同“普通上院議員”相對抗，這不但是時代的需要，而且也是企業家的需要。

“聖職上院議員”看來也許是一個不幸的詞組，但是從歷史上看它是適當的。封建制度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秩序（當它保持着這種秩序的時候），是通過包含在當時天主教會團體中的神父、學者和聖職人員的對抗力量（引用約翰·肯尼思·加耳布雷思教授的形容語）。當這一制度運行順利的时候，教會建立了普遍公認的判斷的標準或準則（在本書中，用“一致的公論”一詞來代表而不是說明這些標準）。它也多少有些粗糙地但充分地判斷了握有世俗權力的人是不是符合這些標準。這種制度決不是十分簡單的；必須不

断地回顾历史，以评价封建的圣职上院議員所犯的过失，并纠正他們所作的錯事。但是，就我所知，現在我們所能尽力做到的，就是树立一批現代的圣职上院議員。

目前，美国的大学及其有关学术机构，乃是历史的圣职上院議員衣鉢的当然承受者。这就是你所以需要它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是很多的）。这也就是你一破坏它們的自由，你就立刻失掉你最需要的一种品质——它們的判断的絕對独立性——的原因。当你从你自己的宣傳部門中接受一种荣誉提名时，这里面有多少欺詐，誰也沒有你自己了解得清楚。

所以根本沒有理由认为那些开发、組織或出色地管理了新的供应来源、交通系統或电子学的偉大应用等等的人，不應該从大学或任何別人那里获得荣誉。但是，如果能够由于实际成就——由于把那条鉄路非常良好地管理了十五年，或是由于（象一家大公司那样）不仅提供了好的产品，而且是建造令人贊美的机器設備来生产这种产品，或是由于同样性质的业务成就——而得到褒奖，那才是使人心曠神怡的事情。換句話說，褒奖應該給予实际的成就，而不是給予业外活动的成就。

第三种困难在于这一事实：大企业家和参加政治活动，可是他們都不願意承认。事实是很明显的。由于他們不是所有者，而只是管理人，所以他們实际上是一种非国家管理的文职官吏。他們直接对四类人負責，这四类人是：他們的公司所由购貨的团体；他們的公司向之銷貨的团体；他們的公司所雇用的雇員；他們的公司对之支付利息或紅利的証券持有人。除此以外，对外的接触面和他們的支持者实际上大于最專門的政治家的接触面和支持者。总结起来，这就是很大的一批輿論。这种輿論不时激发正式政府的

干預，往往是通过国会的調查。自願地或非自願地出現在正式政治活动的舞台上，对于任何大企业家來說，永远是可能的。的确，对于最大的企业的領袖們來說，这种政治任务事实上是經常不断的，虽然在重要程度上有所不同。掌握現代管理工作的这一端，和处理人事、工厂建設或价格方針問題一样，都是他們的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实际政治永远是一种交相授受的問題。你放出一枪，别人就給你連珠回击。在这种过程中没有什么从容宁靜，往往也談不到什么体面尊严。能够安全无恙地从里面跳出来，也許就是你能尽力做到的事情了。美国的政治生活意味着政治家跨在輿論的野馬上，能騎多久就騎多久，如果到头他不摔下来，就算是很幸运的了。結果，美国企业家在結束他們的业务生活时，好些人往往得不到他們所应享的荣誉和声望。

相反地，在某些方面，你也得到多于你所应得的东西。美国公众仍然天真地认为一个在某些事情上成功的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聪明的，正象从前中国的农民认为凡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会治疗普通的感冒或修理钟表一样。曇花一現的杂志和报刊对于任何著名企业家所发表的意見，都給予极大的宣傳和注意。有一次，一个十分成功的电梯制造家竟作为青年女子教育問題的权威出現。亨利·福特在別人的誘劝下过問了許多业外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宣傳性是很大的（而且在这些事情上，他显然是錯誤的）。大使职务和其他一些很伤脑筋的政治事务，往往被放在企业家的身上，虽然这些問題决不是业务經驗所包括的問題。

这可能是很危險的，因为誘惑无孔不入，而失敗的懲罰是不可避免的。要使行动符合于真正的声誉，确是十分艰难。企图使行动符合于虛伪的或騙人的声誉，那簡直是糟糕的事情。然而，认为